

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

ICS BULLETIN

二〇一六年 第二期

袁行霈教授訪談

訪問日期：2016年3月31日
地點：中國文化研究所「澄軒」
受訪人：袁行霈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訪問者：張健教授（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筆錄：徐艷蓮（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內容整理：胡琦（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兼職講師）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封面文章欄目邀得袁行霈教授接受訪問。袁行霈教授談起自身在北京大學求學的經歷，回顧自己的學術研究歷程，並介紹自身在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和中央文史研究館的相關工作。

袁行霈教授1936年生於山東濟南，原籍江蘇武進。現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國學研究院院長、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主任及《國學研究》主編。袁教授亦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曾任第八屆及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及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袁教授的主要著作有《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中國文學概論》、《陶淵明研究》、《陶淵明集箋注》、《陶淵明影像》、《中國文學史綱要》（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元代卷）、《中國詩學通論》（合著）、《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主編之一）、《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袁行霈卷》、《唐詩風神及其他》、《盛唐詩壇研究》（合著）、《中國文學史》（主編）、《中華文明史》（主編）及《中國地域文化通覽》（主編）、《論詩絕句一百首》、《愈廬詩鈔》等。

一、學術淵源：語言和文學的扎實基礎

我1953年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在北大受到的教育是多方面的。1952年大陸教育界實行院系調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文理科都併入北京大學，工科則併入清華；那時候北大匯聚許多著名學者，中文系就有來自原來三個大學的教授，原屬北京大學的魏建功先生、

游國恩先生、楊晦先生；原屬清華大學的王瑤先生和吳組緝先生；原屬燕京大學的林庚先生和高名凱先生。當時北大還有文學研究所，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前身，有俞平伯先生、錢鍾書先生、孫楷第先生等。我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北大中文系，有幸跟隨諸位著名學者學習。我進入北大第一年修讀中國文學史，就是游國恩先生和浦江清先生講授。那時候文學史的課程很重，一個星期有六節課，一共上四年。從先秦兩漢文學一直學到現代中國文學史，訓練非常扎實。我們不僅學習文學史，更要閱讀大量作品，如先秦兩漢文學，游先生講文學史，浦先生講作品選。浦先生是王國維先生的助手，學問非常好。先秦兩漢文學比較難，我們在課下還要跟着文學史的線索閱讀原典，譬如游先生講《尚書》、講《詩經》，我們晚上就去圖書館啃原著，那段時光很愉快。第二年是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文學，由林庚先生主講，他是詩人，對詩歌有獨特的領悟，是最受歡迎的老師。第三年宋元明清文學，又是浦江清先生主講，他會在課堂上給我們唱昆曲，非常有趣。

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楊晦先生非常強調語言與文學不分家，存在「有機聯繫」，因此我大學四年也修了五門語言學課程。法國留學回來的高名凱先生給我們上語言學引論，魏建功先生上古代漢語，周祖謨先生上現代漢語。袁家驊先生上漢語方言學，一種方言一種方言地介紹，開創了大學中講授方言學課程的先例。袁先生從英國留學歸來，穿一身黑色燈芯絨西裝，風度翩翩，學生很為他傾倒；他在課程上教我們用粵語念唐詩，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念的〈楓橋夜泊〉。王力先生在我三年級時從中山大學過來，給我們開漢語史課程，這也是開創性的；講完以後，就出版了他的專著《漢語史稿》。這五門語言學課程對我很有好處，比如漢語史課上要背《廣韻》韻部，東冬鍾江支脂魚微，一直背下來。這樣打下的語言學基礎，對古代文學研究非常重要。另外還請了鄭奠先生講《文心雕龍》，李賦寧先生講西洋文學史，季羨林和金克木先生講東方文學史，余振先生講俄羅斯文學史，曹靖華先生講蘇聯文學史等。北京大學的四年給我打下很好的基礎，北大、清華、燕大三方面名師的教導，使我開闊了學術視野，我終身受益，後來注重多學科交叉研究，大概與此有關。

當時的北大中文系，匯合了三個不同的傳統，其間異同，可以是學術史研究的好題目，我個人更多的感受，是三方面融合得很好。畢業後我留校擔任助教，林庚先生是我的導師，他是清華畢業，在燕京大學教書。林先生的老師是朱自清先生。朱先生是作家，善於寫文章，學術論文的文字也很講究，像〈詩言志辨〉〈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等等，有細密的考證，又有卓越的見識。另外，我自己還很心儀聞一多先生。聞先生1946年就去世了，沒有教過我們，但我讀他的書，受的影響也很大，他在西南聯大，考察少數民族風俗，借以解釋《詩經》，創見很多，文字真像火焰一樣。林、朱、聞這三位先生對我影響很大。俞平伯先生也是我們非常景仰的，他在詩詞鑑賞方面有很獨到的成就，當然還有《紅樓夢》考證。吳組緝先生在北大講《紅樓夢》，是很受歡迎的一門課，他特別注重藝術分析，分析人物性格入木三分——因為他是小說家，故有獨到之處。1993年我們「攷掇」吳先生出一套「吳批紅樓」，他很高興，可惜沒能成書就去世了。

那個時候文學史的課比較扎實，專題或專書的課少一些，這樣做是希望我們更全面一些。學生學習的方法也不一樣，課堂好好聽，筆記好好記，課外要跟著文學史的脈絡揀一些感興趣的別集來讀，只限於課堂是不夠的。

我還很幸運地修讀了一門中國通史，上半年是周一良先生，講到唐代；下半年是鄧廣銘先生，從宋代開始，那一年收穫也很大。這些名教授給外系一年級的學生講課，非常難得。

二、縱通與橫通：從文學史、文明史到地域文化

1995年，我開始主編一部「面向21世紀」的教材《中國文學史》，邀請19所高校的30位教授參加。在這部文學史的總緒論裏，我提到了自己關於文學史的總體看法。一是文學史的定位：過去習慣於用一條線來貫徹文學史，如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法家與儒家等等，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三千年的文學史，眾多的文體，怎麼能用一條線來貫穿？其結果必定是牽強附會。所以我提出三句話，第一句是「文學本位」，把文學當作文學來研究，不做社會學的圖解。第二句是「史學思維」，文學史是史學，要講出史的發展線索。第三句是「文化學視角」，在廣闊的文化學的背景上研究文學。我的意見得到大家認可，我們在書中努力貫徹。

在文學史的分期上，我打破朝代分期，做政治史要按朝代分期，但文學史並不因為改朝換代而馬上變化。所以我提出「三古七段」說，即上古、中古、近古，再細分成七段。譬如近古期，我不以明朝建國為開端，而從明代中葉開始，那時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點像西方的文藝復興，市民活躍，城市繁榮，文學的中心下移，思想界個性解放，出來李贄、王學左派那樣一些人，所以才有《金瓶梅》《牡丹亭》這樣的作品。我並不完全排斥按朝代分期，如果朝代更替與文學史變化吻合的情況，比如「中古」是從隋唐開始，結束南北朝幾百年的分裂，成為一統的新帝國，文學也出現了新的面貌——確實唐代文學與南北朝文學很不一樣。說得更細一些，我的主張是「三古七段雙視角」，大的分期應該按文學本身發展的階段性來劃分，但也不走極端，並不否認文學可以按朝代去研究，也可以有「唐代文學史」或「明代文學史」，兩種視角並行不悖。這個觀點提出以後，在文學史界震動比較大，復旦大學黃霖先生主編《文學史》的明代部分，他是明代文學專家，很贊成我的說法。現在此說大概沒有太大的爭議。後來編《中華文明史》也採用這種分期，以明代中葉為一個新的開始。

我從來不做「掛名主編」，主持的任何書都親自撰寫一部分。《文學史》我不僅做總主編，還主編魏晉南北朝部分，親自寫了三章，還寫了全書的總緒論。編寫過程中，我們有什麼意見都很直率地提出。營造良好的學術氣氛，對集體項目是至關重要的，主持人要容得下不同的學術觀點。南開的羅宗強先生負責《文學史》的唐代卷，他主張把李商隱作為單獨的一章，我支持他，請了余恕誠先生來寫。元代文學部分由中山大學黃天驥先生負責，中山大學的戲曲研究是首屈一指的，他提出戲曲不能僅僅作為案頭讀物，要「立起來」，看它在舞臺上演出的情況，也一理念也貫穿到《文學史》中。

此後主編《中華文明史》，那也是一段很愉快的時光。1999年北京大學進入國家「211工程」，獲得一筆經費，當時主管科研的副校長到我家來，問我對研究項目有什麼設想。我衝口而出：「做中華文明史啊！」。那時我剛編完《中國文學史》，承繼其中「文化學視角」的思路，動員全校人文學科的力量，包括中文、歷史、哲學、考古，還有王邦維等東方文化的學者，以及科技史方面的專家，一起來編一部中華文明史。後來這個計劃作為北大國學研究院的項目，

由我主持，組織了三十六位教授，花了六年時間，編成四卷本《中華文明史》。雖然我列在主編的第一名，但不能埋沒另外幾位學者的功勞——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歷史學家張傳璽先生，還有哲學史家樓宇烈先生，我們共同主編，大大小小的會不知道開了多少。從書的整體設計，到每一卷、每一章的寫法，都經過大家的討論和修改，是一個「團體操」。有些人感歎今後恐怕很難再組織了。劉勇強教授參加第四卷編寫，他說等於又念了一個「文明史」的博士學位。

《中華文明史》2006年出版以後不久，美國的康達維（Prof. David R. Knechtges，人文與科學院院士、華盛頓大學教授）就主持翻譯成英文，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2012年我和他一起到倫敦開了一個新書發布會。在他的帶動下，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稻畑耕一郎教授組織翻譯日文版，把原書四冊變為八冊，現在已經出版了五冊，今年秋天就可以出齊了，去年在東京召開新聞發布會，有400人出席，包括學界、政界和媒體人士等。此外還有俄譯本，由聖彼得堡東方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員翻譯；韓譯本，延世大學翻譯；還有塞爾維亞文譯本正在翻譯，匈牙利文和印地語譯本也已簽約。這部書可以說走向世界了。

我後來主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是延續文學史和文明史的思路，但從縱向變為橫向。1978年我曾寫了一篇文章，思考自己今後的學術道路，注意到章學誠《文史通義》中「橫通」的觀念。章學誠看不起「橫通」，這有點像萬金油，什麼都知道一點，但都沒有深入的研究，有如賣書的書商。但我們用新的眼光來闡釋之，把「橫通」解作多學科交叉研究，未必不是好事。我有一篇小文章〈橫通與縱通〉，一方面要堅持「縱通」，對某一門具體學問的發展演變有深入的研究，同時也要關心相關學科。比如做文學的人要關心哲學史、政治史、藝術史等等。這是我當時對自己學術路向的考慮。從文學史到文明史，已經鋪開了，涉及到許多學科，而中國幅員廣大，地域差別顯著，譚其驤先生曾經說過，如果不了解地域文化，很難對中華文明有深入的理解。所以我藉着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的機會，組織中國各地文史館，編了34卷《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地域文化的區分可以按照春秋戰國的分法，如齊魯文化、燕趙文化、巴蜀文化等等，但我們為了編書的方便，按照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行政區劃分卷，港澳台也各有一卷。這樣可以發揮各地的積極性。我們邀請了各地文史館以及其他方面的學者共約500人參加。香港卷由饒公作名譽主編，王國華、鄧聰先生都作了很大貢獻，值得一讀。我不希望中國文化變得「千人一面」，中國文化是多元的，應當保持各地豐富多彩的特色，找出各地文化發展的優勢。

2009年我有一個冒險，提出新編新注十三經的想法。原來的十三經，是「儒家十三經」，我則希望編一部中華文明的十三經，不限於儒家。中國文的源頭是多元的，有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兵家等等。我主張去掉舊十三經中的六種，即《爾雅》、《孝經》、《周禮》、《儀禮》、《公羊傳》、《穀梁傳》，補充六種，即《老子》、《莊子》、《墨子》、《孫子》、《韓非子》、《荀子》。新編之外，還要做新注，用今天掌握的資料，全球的視野，做新的解釋。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更多的出土文獻和傳世善本，加上中外交流頻繁，應該利用這些優勢對經書作新的解釋。這個項目我放在國學研究院，不專門申請課題，希望水到渠成。項目由北大的十三位老師負責，我親自擔任《詩經》的新注。我希望北大成為經學的重鎮，振興經學。這項工作正在進行。

三、大雅宏達，於茲為群：國學院、漢學家研修基地和中央文史館的工作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的歷史要追溯到1992年，那時候南懷瑾先生為我們捐了10萬美金，指定要做傳統文化研究。當時我們策劃出版《國學研究》集刊，一年一卷，至今已出版三十六卷；還計劃出版《國學研究叢刊》，出版了幾十種書。2001年我們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畢業生多已成為著名學者。在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我們召開了漢學研究國際會議，270位各國頂尖學者參加，是一次盛會。出版方面，有上述的《中華文明史》《新編新註十三經》等等。國學研究院沒有一位專職老師，都是兼職。我們的口號是「虛體辦實事」。除了深入的研究，我們也做一些普及工作，借用王力先生的齋號，我們的工作算是「龍蟲並雕」。我們所作的普及工作，影響最大的是150集的電視節目——「中華文明之光」，與中央電視臺合作，季羨林先生、侯仁之先生、鄧廣銘先生都出來講，後來出了一大套書。

2009年，北京大學與國家漢辦合作，建立了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叫「研修基地」，是與國外漢學家共同研究學習，取長補短。基地成立後，我們編了兩份刊物，一是《國際漢學研究通訊》，劉玉才主編，目前已經出版十一期；二是與蔡宗齊先生合作的《中國文學與文化》期刊，由中外學者共同組成編委會，用英文在美國出版，已經出版了四期。另外我們也在跟蔡先生合作，編寫《如何讀中國文學》，蔡先生已經出版了詩詞部分，我們一起從詩詞延伸到小說，戲曲，文章，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已經接受出版。2014年我們召開了國際漢學翻譯家大會。翻譯是一個瓶頸，特別是當代的研究著作翻譯不出去。基地曾邀請多位國際著名漢學家來工作，如麥大維、汪德邁等都曾來基地研究半年，此外還有不少青年漢學家來進修。還有一個重頭戲，就是榮新江教授的馬可波羅項目，包括研究和《行記》的重新翻譯，他做事情很細緻，有讀書班，帶著學生逐句地讀，還有實地考察，去過伊朗等地，我全力支持他，給他最好的條件。今年秋天開始，研修基地和國學院在一起辦公，一進北大西校門，面對校長辦公樓，左邊是外文樓，右邊一棟樓就是我們的，國學與西學相對相應，這才是北大應有的氣象。這棟樓命名為「大雅堂」，取班固〈西都賦〉「大雅宏達，於茲為群」之意。

北大之外，我還在中央文史研究館工作，那裏集中了文史研究的大家，我們一方面為政府提供文化建設方面的建議，另一方面也做些研究工作。啟功先生是上一任館長，我協助他編了一部《綴英集》，是中央文史館館員的詩詞選，包括謝無量、沈尹默、齊白石、章士釗等先生的作品。啟先生去世後，2006年我接任館長，也編了不少書，目前正在做的《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百篇》，從三千多年的中國文化經典中選出一百篇，自《尚書·皋陶謨》到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選取有關修身立德、治國理政、伸張大義、刺世嫉邪、倫理親情的文章。希望今年秋天可以出版。

回顧過去的學術及生活經歷，我有一句話：「常懷感激之心，長存謙遜之意。」我能做成一點事情，有賴他人的成全。我很感激我的老師、同事、學生，以及國內外的朋友們。一個人要懂得感激，要保持清醒。我在中大，和師生們接觸很愉快，學到了很多東西，希望以我的感激之心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朋友們共勉。

■ 文物館珍貴古代碑帖入選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中國文化部於5月24日上午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第五批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下稱《名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共有八件碑帖藏品入選，均為北山堂捐贈。《名錄》由文化部擬定，經國務院批准後公布，主要收錄1912年以前書寫或印刷、以中國古典裝幀而具有重要歷史、思想和文化價值的珍貴古籍，及少數民族文字古籍。自2008年至今，首度有香港機構入選，中大文物館是香港惟一入選的文博機構。

中大文物館成立逾四十載，現時藏品總數已達一萬五千件，其中碑帖收藏享譽國際，曾赴北京及日本等地展覽。是次入選第五批《名錄》的藏品包括：

一、西嶽華山廟碑（馬氏小玲瓏山館本／順德本）

此碑立於東漢延熹八年（165）於陝西華陰西嶽廟內，此碑被喻為「漢隸第一品」。原碑於明代已毀，其拓本更足珍貴。其中文物館藏的順德本拓印年代最早，字畫清晰，是傳世最顯赫的四本之一。

二、東漢夏承碑（華氏真賞齋本）

文物館藏宋拓本《夏承碑》為明代無錫華夏真賞齋所藏，至清代傳至著名碑帖收藏家李宗瀚，曾經大儒翁方綱等題跋。《夏承碑》立於東漢建寧三年（170），原石明中期已毀，傳世拓本中以真賞齋本年代最早，此拓隸書對清初書壇影響甚鉅。

三、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汪氏孝經堂本）

《九成宮醴泉銘》由名臣魏徵撰文，初唐四家之一歐陽詢書，是歐陽詢成熟至晚年期間登峰造極的楷書代表作，用筆精煉穩健，果斷利落，是重要楷書範本。

四、唐李邕雲麾將軍李思訓碑（吳榮光舊藏本）

《李思訓碑》由唐代書法家李邕撰並書。李邕的行書向來備受推崇，元代趙孟頫、明代唐寅、董其昌均受其影響。拓本上有康有為、黃賓虹、羅振玉、梁啟超、王國維等題跋。

五、宋刻淳化閣帖泉州本卷六至八集王羲之書（陸恭舊藏本）

《淳化閣帖》是宋太宗下詔王著甄選歷代法書摹刻於北宋淳化三年（992）的一套十卷叢帖。此帖原拓已不存，文物館藏本屬於南宋初刻的「泉州本」，是現存四種主要《淳化閣帖》宋代重刻系統之一。文物館藏本甚得王羲之書韻致，墨紙經歷八個世紀仍保存良好，甚為難得。

六、游相蘭亭 甲之二 御府領字從山本蘭亭序

七、游相蘭亭 乙之五 錢塘許氏本蘭亭序

八、游相蘭亭 庚之三 莫知所出本蘭亭序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353）王羲之與謝安等在山陰（今浙江紹興）蘭亭舉行修禊，臨流賦詩，王羲之乘酒興為詩集寫序，稱為《蘭亭序》。至唐太宗遍訪天下王書，得《蘭亭》後命人臨摹多本以賜王公貴胄，真蹟則陪葬昭陵。「游相」即南宋理宗朝丞相游侶（？-1252），他曾收藏近百種《蘭亭》拓本。傳世至今的「游相蘭亭」共四十餘種，文物館共收藏十種，是全世界收藏最多「游相蘭亭」的博物館，其中三種均各具特色而入選。

此外，為配合第五批《名錄》的公布，文化部及國家文物局將主辦「國家珍貴古籍特展」，於6月至8月間假北京國家典籍博物館舉行。文物館藏（五）宋刻淳化閣帖泉州本及（六）游相蘭亭御府領字從山本蘭亭序將於「特展」中展出。

■ 中國文化教育班「國學班」現正招生

承蒙旭日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的慷慨資助，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將舉辦一系列「中國文化教育班」，藉以推廣中華文化。其中的「國學班」將於6月至8月期間開課，分別研習《周易》、《春秋左傳》以及《說文解字》這三本經典著作。最新課程消息，請瀏覽中國文化研究所網站。

■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利希慎訪問學者計劃」

承蒙「利希慎訪問學者計劃」資助，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邀得來自海外及內地學者到訪香港中文大學，並舉行研討會，最新消息請瀏覽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頁。

	學者	所屬院校	到訪日期
1	陳俊華	中央財經大學城市與房地產管理系	2016年4月6至16日
2	王君超	中央黨校	2016年4月11日至5月11日
3	王雲龍	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	2016年4月13至20日
4	公婷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年4月18至20日
5	裴敏欣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2016年4月18至20日
6	由冀	University of Macau	2016年4月18至20日
7	李成言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2016年4月18至21日
8	黃一玲	西南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2016年4月28至29日
9	胡發雲	職業作家	2016年5月17日
10	劉曉原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16年6月4至8日
11	鄭維偉	上海社會科學院	2016年6月15日至7月15日

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聯合舉辦

「第三屆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

為培養中國文化研究領域的青年學者及增強青年學者之間的互動往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自2014年起舉辦「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第三屆「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由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及中國文化研究所聯合舉辦。論壇收到二百三十九位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學者申請。經過籌備委員會的嚴格甄選，最終邀請其中二十八位學者出席會議。與會者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亞洲其它國家、澳洲及歐美地區，其中三分之二與會者來自海外，體現論壇推動中國文化研究的國際性交流的主旨。今年特設主題「中華帝國晚期的文化與社會」，與會者就明清及民國期間中國社會各方面，如語言文字與文學、社會祭祀與宗教、社會經濟、技術與交通、物質文化與藝術、跨文化交流等發表論文及展開熱烈討論。



以下為兩位青年學者的與會經驗分享。

長谷川正人 紐約大學訪問副教授

我非常榮幸能參與本屆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此次跨領域的論壇給我難得的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學者交流，深入探討明清時期多樣的中國文化研究範疇。為期三天九節的

發表和討論都充滿了真摯和友好氛圍，點評細緻中肯、提問踴躍熱烈，至今讓我有時光倒流、意猶未盡的感覺。本屆論壇開闊了我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視野，再次讓我感受到從多角度思考歷史的重要性。與會學者給我帶來的啟發及我們之間建立的友誼對我今後的研究有着積極、深刻的影響。

何幸真 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候選人

非常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給予我這麼好的機會，參與此一匯集各地青年學者的盛會，向領域互異卻擁有共同熱忱的學友們，分享我近期研究的初步成果。我想正如主辦人黎志添教授所言，這既是一個提供各地學人交流研究構想的平臺，也是一個建立彼此友誼並促進未來更多合作的契機。

再次感謝主辦會議的師長與工作人員，以及會議期間一起交流、討論的學術夥伴們。這三天對我來說，是一段非常充實、難忘且美好的時光。



2016 年第二次「午間雅聚」

西方地理觀的演化： 16 世紀地理大發現的文化與歷史淵源

陳方正

中國文化研究所

陳方正教授在美國哈佛大學和普蘭代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分別獲得物理學學士及物理學博士學位。一九六六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任職講師，一九七七年升任高級講師。一九八零年出任大學秘書長，至一九八六年出任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教授為一位傑出學者和大學行政人員，於香港中文大學服務近達五十年，現任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聯合書院資深導師，及物理系榮譽教授。陳教授於二零零四年獲頒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竺可楨講席教授。

2016年4月8日，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活動邀得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陳方正博士擔任講者，與我們分享他的新近研究成果，主題為「西方地理觀的演化：16世紀地理大發現的文化與歷史淵源」。

陳方正教授介紹，他的講題主要探究十六世紀西方人發動世界地理大發現背後的文化與歷史淵源。西方社會在十五到十六世紀之間進入現代發展階段有四大關鍵標誌，其中包括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1460年印刷術的傳播、1492年新大陸的發現、以及1517年宗教改革。除了新大陸的發現以外，其它三點都是與歐洲自身的發展有密切關係，君士坦丁堡陷落是歐洲經歷的重大挫折，印刷術與宗教改革屬於歐洲內部的變化。但新大陸的發現則是歐洲對世界的進軍，徹底衝擊、改變全世界格局。從這一角度，新大陸的發現更具全球意義。實際上，早在西方人進行地理大發現之前，中國便有鄭和在1405至1433年間七次帶領船隊西下西洋，帶領的船隊規模及財富都超過後來西方人所帶領的船隊，但卻沒有對世界產生革命性改變，這是為什麼？陳教授試圖探究西方地理大發現的文化與歷史淵源，從而回答以上這一問題。

陳方正教授指出，地理大發現的歷史淵源可以粗略歸納為七大古代與近代因素。古代因素包括西方人的遠航遠征冒險精神以及西方古代高度發達的地理科學；中古因素主要因為蒙古帝國

擴張打通歐亞，引發羅盤的應用和航海圖的出現、同時歐洲人對於東方財富和到東方進行貿易都有了新的憧憬，也因此對遠航產生更大興趣；近代因素則與伊斯蘭帝國進逼歐洲有密切關係。歐洲試圖驅逐伊斯蘭教徒，引發重光運動，並繼續攻打伊斯蘭教徒，宣揚十字架。同時，因為當時伊斯蘭教徒佔據北非，其黃金與黑奴貿易給伊斯蘭教徒帶來巨大利潤，引發歐洲人的嫉妒；另外，葡萄牙航海家亨利親王個人的意志力和堅持也成為西方人發動遠航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正是以上七個因素，很大程度上引發了後來的葡萄牙西非遠航，葡萄牙南亞遠航以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西方古代人的遠航、遠征、冒險精神，可以從西方古代的商业貿易社會說起。自古以來，移民、遠征和開創殖民地便是西方社會的傳統。有關西方古代遠航遠征的記錄很多，如西方的《荷馬史詩》等，這些遠航史詩都是鑄造西方人心靈的重要作品。另外，在西方古代歷史記載中，也至少記載了五趟著名的遠航冒險。最早的包括公元前六百年，埃及法老王派遣腓尼基船隊繞航非洲，證明非洲是一個大島；迦太基王漢諾帶領船隊到非洲西岸建立多個殖民地；法國馬賽人皮實雅斯據稱在公元前四百年從直布羅陀海峽出發，遠航到北極圈；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也是歷史上歐洲人的一次重大遠航，讓歐洲人首次知道有印度，此後埃及法老派遣尤多索遠航印度。1291年，意大利的韋瓦地兄弟試圖繞航非洲到印度，最終沒有成功。這些遠航歷史記錄都表明歐洲本身具備很強的遠航探險傳統。相對而言，在中國的歷史記錄中，類似的記載相對較少。如周穆王巡情中國，並遇見西王母的小說記載，但周穆王與西方尤利西斯不同的是，周穆王是帶著大批軍隊出巡，接受各方朝拜，不同於尤利西斯的個人冒險遠征。另外，徐福的南洋之行以及張騫、班超的遠航便是中國古代少數可見的遠航記錄了。

西方的地理科學有很長的歷史傳統。西方的第二個自然哲學家就是地理學者阿那克西曼德。他曾預言，地球是一個自由浮動的圓柱體，人類處於圓柱體的一端表面之上。兩百年後到了柏拉圖時期，西方人意識到地球是一個球體，環繞地球一周的可能性出現了，地球的經緯度及位置也由此有了客觀標準，西方地理學由此開始迅速發展。公元150年托勒密已經在他的《地理學》（八卷）中討論如何將球面上的位置投影成一個平面，並發展出兩種投影辦法，這對後來世界地理地圖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亞歷山大時期伊拉托色尼準確地實測了地球周長，這些地理知識都為西方人後來的遠航提供了良好的支撐。相對而言，中國古代地理學儘管文字記載繁多，有豐富傳統，如《禹貢》、《山海經》、《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等。戰國即出現精確實測地圖，其後形成大傳統，但以陸地山川為主，不注重海岸及海外。總體而言，對大地整體形狀缺乏研究，天文地理學僅憑經驗。

引發西方地理大發現的中古因素包括羅盤和航海指南圖的使用，以及馬可波羅行記帶給歐洲人的刺激，引起歐洲人對遠方事物的興趣。公元1270年，蒙古人征服廣大的中亞地區及中國南宋，把歐洲到東亞打通了。馬可波羅因為這一機緣，從歐洲到達中國。馬可波羅行記對西方人產生

巨大衝擊，風行一時，傳播極廣。馬可波羅行記基本上是一部亞洲百科全書，特別是地理記載。其中強調元蒙特別是中國的廣大與富強，並提到朝鮮、日本、中南半島、爪哇等地方，擴展了歐洲的世界觀與夢想，刺激了歐洲人對遠方財富的嚮往。相對而言，中國早在馬可波羅之前便有法顯的《佛國記》以及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等，但是他們的遊歷記錄並沒有讓中國人對遠方產生宗教以外的吸引力和想像。另外，元朝蒙古人帶給西方更重要的是指南針。指南針傳入歐洲以後，歐洲很快出現航行指南圖（Portolan Map），為實際應用的海圖，記載大量海岸上地名。1459年，地理大發現的前夕，在毛羅教士製作的世界圖上，已經顯示日本、錫蘭、黃河、長江、非洲南端、大洋環繞三大洲等。指南針和航行指南圖是推動西方遠航的重要工具。相對而言，中國製作的地圖僅僅在陸地的指示上非常精確，對於海岸線及海外的指示則非常籠統，對遠航幫助不大。



（右起）黎志添教授、楊汝萬教授、陳方正博士、鄭宏泰教授

近代西方遠航的淵源主要跟歐洲對伊斯蘭挑戰的回應有密切聯繫。重光運動非常重要。伊斯蘭教在公元622至750一百多年間佔據整個中東，北非及西班牙絕大部分地區。西班牙基督教徒試圖驅趕伊斯蘭教徒，引發後來漫長的重光運動，把伊斯蘭教徒從歐洲驅逐出去，後達成伊比利亞的重光（790 - 1300）及葡萄牙的建國（1249 - 1385）。葡萄牙建國以後，繼續攻打佔據北非的伊斯蘭教徒，由葡萄牙亨利親王帶領，經過艱苦不懈的努力，最後成功在西非建立多個據點（1415 - 1460），開始對非洲西岸的探索，開啟了歐洲人南下非洲的勇氣，這是整個歐洲海外大發現的基礎。亨利親王去世以後，葡萄牙君主繼續主持海外探索（1460 - 1515）。同時間馬可波羅行記逐漸為大眾熟知，葡萄牙人的眼光便從非洲西岸的黑奴與黃金交易，拓展到遠東的香料貿易，海外探險進一步拓展。其次，托勒密地理學中的天文定位也在此時發揮了作用。之後1488年迪亞斯發現好望角，1492年西班牙人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這便是西方海洋擴張的連鎖觸發機制。相對而言，鄭和下西洋更多的是一種出巡，中國並不將遠航與國家興旺相聯繫。西方的遠航恰恰相反，遠航成為國家擴張，建立帝國的重要手段，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

（注：此文為陳方正教授演講摘錄，未經陳教授批閱。）

2016 年第三次「午間雅聚」

全球城市新中產之自我想像： 從《小時代》與新上海人談起

黃宗儀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黃宗儀教授現任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她在台大外文系完成學士及碩士學位後，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比較文學系取得博士學位。她的學術研究長期關注晚近東亞大都會因應資本全球化而生之地理景觀與日常生活，方法論上取徑論述分析與文化研究，以香港、東京、臺北等城市為對象，關切新興社會主體與都市景觀發展議題。專書包括 *Walking Between Slums and Skyscrapers: Illusions of Open Space in Hong Kong, Tokyo and Shanghai* (香港：香港大學出版，2004)，《面對巨變中的東亞景觀：大都會的自我身份書寫》(臺北：群學出版社，2008；北京：廣西師範大學，2011) 目前執行中之新書計畫將從流行文化的地緣政治談南中國的經濟發展敘事與情感政治。

2015年4月25日，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活動有幸邀得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黃宗儀教授擔任講者，與我們分享其最近的研究成果，演講主題為「全球城市新中產之自我想像：從《小時代》與新上海人談起」。

上海的全球化是黃教授一直以來關注的議題，她首先綜述了自己的相關研究，包括上海的都市空間生產、老上海懷舊論述的全球城市 (global city) 形象塑造，以及上海與臺北的全球區域鏈接與跨國身份想象。近年來當紅作家郭敬明銷量百萬的小說《小時代》引起了黃教授的興趣，這位「小城青年」頗具爭議的上海書寫成為探討「新上海人」身份的絕佳文本，基於此，黃教授與其中大研究生董牧孜合作了此一研究，透過郭敬明現象介入分析中國全球城市新中產之自我想像。

黃教授指出中國的城市化背景是理解《小時代》上海再現的關鍵。改革開放後，毛時代的「反都市主義」風向被打造曼哈頓式大都會的慾望所改變，「撤縣改市」政策曾是城市化展開

的重要方式，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裡中國區域地理最顯著的變革之一便是縣城的「消失」（Cartier 2013）；而以深圳為代表的經濟特區、以上海浦東為代表的國家級新區則為中國全球城市的打造提供了重要範本。此種激烈的城市化發展與競逐催生了城市之間巨大差異，並造成了中國城市的等級化，此一現象亦伴隨着個體流動性慾望的階序化（Lisa Hoffman），並重構了都會主體作為「世界人」、新自由主義經紀人的自我身份想象，隨着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富二代」亦逐漸取代九十年代以來風行的「成功人士」形象。

黃教授指出，郭敬明及其《小時代》正是在此背景下橫空出世。郭敬明「生長于西南小城，發達於超級大都會」、透過個人努力「由最普通的『民二代』」成為「耀眼並年輕的『富一代』」（《南方週末》「2013中國夢踐行者」頒獎詞），儘管郭敬明的成功是不可複製的個案，但他由「小城青年」變身大都會成功人士的流動經驗卻是當下中國的普遍現象。

在黃教授看來，郭敬明《小時代》的上海書寫不可忽視，可以說這部極度賣座的小說重構了有關「新上海」的城市想像。黃教授簡述了《小時代》三部曲的故事及其相關爭議。故事講述了四位上海女孩在2008年至2011年的青春成長故事，此時正是上海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郭敬明自稱《小時代》是「獻給上海的金色讚美詩」，自言：「我希望以後提起新上海，人們就會想到我的《小時代》」。黃教授援引了黃平、韓寒等人的相關評價，指出《小時代》普遍被視為假充本土的外地人所寫的虛假上海故事，郭氏筆下的上海被視為缺乏真正的「上海性」，是向其他城鄉結合部的「小城青年」兜售「大上海的繁華和奢侈品的一個教程」（韓寒語）。

黃教授認為，要理解郭敬明的上海再現方案及其備受詬病的原因，「新上海人」的身份是關鍵所在。《小時代》的書寫是對當下「新上海」城市形象的回應，它所指認的「上海性」是基於「小城青年」的經驗來言說的，真正的敘事主體是作為「新上海人」的自我，矛盾的是，這個新上海人必須一再假託本地人的身份出現，卻又始終被視為冒牌貨。

黃教授指出，「新上海人」的概念首先與都會新移民以及上海全球城市形象打造的社會語境有關，最初官方論述中用以指涉來到上海發展的跨國人才和專業精英，此後成為外來中產階級自我表述的身份標籤。郭氏筆下的上海即是此一新興都會白領階層的海，其「上海性」表面上呈現為「海納百川」的包容性。黃教授透過文本分析指出，一方面，郭敬明將人民廣場上「足以購買任何女人靈魂的水晶鏤空的Jimmy Choo高跟鞋」與「充滿著勞動情懷的綠色解放牌雨靴」（2014）所代表的不同階層身份並置，以顯示上海對所有外來者的開放性；另一方面，郭敬明所再現的上海又是高度階序化的，透過衣著打扮及口音行止辨認外地人的低下品味是小說一再出現的書寫主題。小說極力描摹外地遊客與上海都會格調的格格不入：「他們穿著各種大型連鎖低價服裝店裡千篇一律的衣服，用各種口音大聲吼著『看這裡！看這裡』。他們和馬路對面鋒利的奢侈品世界，僅僅相隔二十米的距離」（2013）；與此對照的則是作為「新上海人」的高級白領，郭敬明透過描摹其繁複描摹示意只要掌握了中產階級的生活美學，就能與都會

華麗區、乃至整個城市渾然一體。透過這些角色的塑造郭敬明一再暗示掌握都市感性之精髓對於「新上海人」身份成立的關鍵意義。

黃教授指出，郭敬明的「新上海人」敘事基調試圖擺脫「小城青年」出身論，呈現出通過習得審美格調來實現大都會身份轉換、再定義成功人士的特徵，這在小說中是透過種種奢侈品的盛大鋪陳來達成的：Prada 毛衣、Dior 禮服、Armani 沙發、Cartier 髮卡，數不勝數。黃教授指出，此種邏輯使



得《小時代》弔詭地成為類似於19世紀禮儀手冊 (manners manual) 的當代都會指南，禮儀手冊提供的功能不僅是傳授鄉下進城的青年學做城市人的文化知識，更要教導大眾如何辨識偽裝者 (imposter)，因為後者「費力追求的負擔與文化能力的不足」(Skeggs 2004) 必然露出馬腳。

郭敬明為形塑此種新中產身份，極度戲劇化地展演了布迪厄 (Bourdieu) 對於品位的解讀，黃教授藉助小說中顧里對於「秋褲」的尖刻諷刺展開了分析。文中作為「富二代」的顧里對於外地人城鄉結合部格調的羞辱，亦標誌着作者作為都市新貴已取得審美經驗的論述權與權威感。黃教授指出這種再現方案與晚近中國階級身份的論述相關，從擁有財物之個體 (possessive individual) 到美學化的自我 (aestheticization of self)，階級與自我身份的形塑密不可分。90年代末，福塞爾 (Paul Fussell) 的《格調：社會等級與生活品味》(Class: 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 中譯本一經出版即在中國大陸大獲暢銷，譯者甚至將前言標題取為《社會品味：社會等級的最後出路》。此種暢銷背後正是晚近中國以「格調」(class) 取代階級 (class) 成為主流論述的現象，消費商品符號的美學化日常成為都市中產階級表述自身意識形態、生產社會身份的重要方式。

黃教授進一步指出，大眾對《小時代》的「上海性」缺失的指認還需梳理「上海人」、「新上海人」與外省「小城青年」幾種地域身份的轉化。實際上，「新上海人」的稱謂除了前述意涵，在媒體與網路的使用中卻帶有強烈的貶義色彩，暗示外來與本土之間某種基於象徵資本的差異 (冒牌貨 / 真貴族)，同時寄寓了本地主義話語下升斗小民對外來者 (不論白領精英或農民工) 的普遍不滿。郭敬明的成功欠缺道德光環，無論何等功成名就，小城的幽靈似乎從未真正離開過他。最後，黃教授總結指出，郭敬明的案例對於理解當下中國全球城市「新中產」如何自我想像、如何透過流動性實踐重塑社會主體身份具有重要意義。

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公開講座

香港領土型幣制的演進 ——以銀輔幣為中心（1883 - 1919）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何漢威教授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哲學碩士，澳洲國立大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香港公開進修學院首席講師等，何教授的研究專長為中國近代經濟史，其主要著作包括《京漢鐵路初期史略》（1979）及《光緒初年（1876-1879）華北的大旱災》（1980），另撰有論文多篇。

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邀得何漢威教授於2016年4月11日主持公開講座，題為「香港領土型幣制的演進——以銀輔幣為中心」。講座概要如下（詳情請參考何教授的文章：「香港領土型幣制的演進——以清末民初港、粵的銀輔幣角力為中心」，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本1分（2015/03/01），P97 - 227）：

何教授的講座以時為經、以事為緯，取資英國殖民地部、外交部檔案、國會文書、香港立法局文書及會議紀錄、政府憲報、當日香港中外報刊，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就前人未發之覆，以清末民初港、粵的銀輔幣角力為中心，探討香港領土型幣制的演進歷程，並就其間港粵、中英、港英、廣州北京，以至香港內部官商及商人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作具體而微的論述，深化對當日港、粵貨幣關係的認知。

何教授認為，維持健全輔幣制度的標準處方之一，就是限制輔幣流通數量。清末民初香港及廣東政府在發行銀輔幣時，顯然沒有奉行這一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守則。從十九世紀九〇年代中葉起，來自輔幣的利潤，成為港府歲入中值得注意的項目，最高兩年（一八九五、一八九八）的比重分別為6.14%及5.07%，而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一年五年間每年平均為4.41%。一九〇二年開始走下坡，以後每下愈況，到一九〇五年已是末路窮途。與此同時，廣東當局開始大規模鑄造以二角為主的銀輔幣，一九〇五年更達到巔峰。從一八九〇年中到一九一二年間，廣東所鑄造的二角銀幣，總值約在1.3億元上下。香港發行銀輔幣利潤日見萎縮，正是港、粵的銀輔幣在市場上角力此消彼長的寫照。

港、粵的銀輔幣大量充斥香港市面的結果，同步貼水情況出現，儘管高低略有不同。一九〇六年四月港督Nathan決定將運抵香港，尚未發行的一批銀輔幣（總值339.8萬元）運回英國，剝奪其貨幣資格，作為條銀出售；這項措施成為港府處理稅入所收過剩銀輔幣的基本方針。為落實銀輔幣回籠的政策，港府每年須編列十餘萬元的預算應付這項開支；從以往十年間（一九〇三及一九〇五年除外），每年來自輔幣的利潤十多萬元，煙消雲散之餘，每年尚須耗費十餘萬元善後，前後感受落差之大，可以想見。

一九〇七年八月到任不久的港督Lugard，任命一個由社會賢達組成的輔幣委員會，就銀輔幣善後提出報告。十一月委員會提交報告書，其中人數略多一派主張採取斧底抽薪辦法，嚴禁中國銀輔幣進口及在港流通；人數略少一派則針鋒相對，提出不同對策，認為執行嚴禁只會使港、粵貿易深受其害，觸發粵方報復的可能，與中國協商或為解決問題的切實可行途徑。因彼此意見過於分歧，報告書無法就相關問題達成共識。港府以後在處理輔幣問題上，基本上沒有重大作為。

一直要到一九一二年中，主、客觀的環境及氛圍轉為有利，從而加速了港英當局徹底解決銀輔幣問題的步伐。港府終於在一九一三年六月通過禁止外國銀、鎳幣進口及在港流通的法令，並於翌年三月一日施行。禁止廣東銀輔幣進口是一回事，徹底解決香港發行的過剩銀輔幣又是另一回事。港府最初著手處理這問題時，困難重重，幾陷於一籌莫展。一九一六年後連串有利因素交集，問題終在三年後徹底解決，不再成為港英當局揮之不去的夢魘。表面看來，輔幣似乎是個小問題，但從清末民初港、粵的銀輔幣角力這段歷史所見，充分印證了經濟史家或經濟學者所說「零錢的大問題」，確為至理名言。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辦

《良渚玉工》學術成果發布會暨 良渚文化玉器與中國古代玉器工藝學術座談會

為展示良渚玉器工藝技術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動中國史前玉器工藝技術及相關問題研究，2015年10月9日上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聯合研究基地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承辦的《良渚玉工》學術成果發布會暨良渚文化玉器與中國古代玉器工藝學術座談會在北京召開。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歷史研究所、故宮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金沙遺址博物館、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地質大學、山東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及在京媒體代表，共60餘人參加了此次座談會。

座談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研究員主持，王所長在開幕致辭中介紹了與會嘉賓和此次座談會的緣起，並提到古代手工業的研究是中國考古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目前對於手工業的考古學研究尤其是古代工藝技術的研究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相對薄弱，我們需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對於古代工藝本身的研究，不僅僅體現了先民的發明創造，同時也是中華文明內涵的一部分，且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高等級的手工業製作、使用和分配與國家王權緊密相連，與精神層面的發展相互聯繫。《良渚玉工》將人類文化中最重要技術、社會、精神文明三個方面，以玉器研究串聯起來，為中國玉器研究開闢了一片新的天地。

良渚文化中高等級的玉器製作，為權貴階層所控制，其大型墓葬中隨葬的眾多精美玉器，已經超過了裝飾品的層面，是一種等級和權力的象徵。由此可見，對玉器工藝和社會權力之間聯繫的探討是研究的重要部分。

良渚玉器是良渚文明的重要部分，從良渚玉器的工藝和技術上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的發展狀況，在這個意義上，《良渚玉工》不僅詳細分析了琢玉工藝和技術進步，而且展示了玉器所反映出的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對考古專業成果的展示起了示範作用，值得學界推廣。同時也讓學術界之外的人，通過此書瞭解古代中國先民創造的在世界上獨具特色的玉文化。讓民眾瞭解具有東方特色的玉文化。

作為《良渚玉工》這本書主編之一的鄧聰教授在發言中詳細介紹了本書的幾點創新之處。一，將微刻技術與王權緊密相連。微刻技術在良渚玉器中極罕有，其巔峰之作集中於反山M12大墓，其中包括良渚文化的琮王、鉞王。根據以上現象，提出微刻技術應當代表了良渚文化中

的王權，為當時的王者或者貴族階層所壟斷。二，良渚玉器在生產上可能存在不同階層的玉工。反山大墓以及瑤山M12的玉琮上都有大面積的凹凸面缺陷，和表面精美的微刻相比，為何會有這種精拙對立的現象呢？鄧聰教授認為這可能是玉器生產加工過程中由不同階層的玉工進行而造成的，民間玉工參與玉料的采集、初步加工，而貴族階層則掌握著高級玉器的製作，玉器表面的微刻技術是琢玉工程的最後階段，由貴族階層壟斷，不同的加工痕迹留下了階層的烙印。三、良渚王者玉器出于同一人之手的發現。通過比較反山和瑤山三件神人獸面圖像，可以看出它們複雜的加工工藝基本相近，有可能出自同一玉工之手，反映了貴族集團在玉器加工製作技術上密切的交流。四，良渚玉器價值等級遞變的發現。從玉的質量、大小、整體製作技術水平、微刻技術的有無及粗糙和精細的程度等方面比較研究可以將良渚玉器分為不同的價值等級，其背後反映了貴族階層對高等級玉器加工工藝的控制。五，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重新定位在東亞視角下良渚玉器的源流與地位。為中國玉器研究開闢一片新天地。

綜合起來，大致有以下兩點：

1. 《良渚玉工》中對玉器工藝微觀的研究方法使得此書成為我國現代考古學研究進入新階段的標志，也是考古學深化研究階段的標志性成果。其研究成果將會為眾多考古研究領域提供可以借鑒和參考的經驗，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轉型提供新的契機。

2. 本書對良渚玉器的研究，不局限於工藝本身，將對玉器工藝背後的技術層面、社會層面和精神層面的探索都聯繫了起來，為我們今後研究玉器提供了新視角。同時，其通過借助顯微攝像技術深度挖掘考古資料信息的做法，為中國考古學進一步借助新的技術和手段，對考古資料進行第二次發掘，深度解讀資料背後的信息起到了示範作用，這一研究方法會逐漸成為考古學科在新形勢下的發展趨勢。

王巍所長在最後總結發言中提出，一：開放合作是促進學術發展的方向；二：設計好一個項目是推動研究的重要前提，同時也是推動人才建設的重要方法。三：工藝技術層面的細微研究要見人、見社會、見精神。四：新方法的開發和利用，有時候會對學科的發展有革命性的突破。五：潛心研究是學術發展的唯一的途徑。本書是具有示範性、典範性的成果，希望在全國推廣。不僅僅是玉器的研究，其他工藝方面也可借鑒，共同促進中國古代手工業的考古研究。

（轉載自「中國考古網」2015年10月9日）



座談會情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長致辭



香港中文大學鄧聰教授發言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中國考古聯合研究基地、歷史系合辦

「玉器與王權誕生」研討會

長期以來，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一直被公認為是中國最早的王國都城，代表「華夏第一都」，除了安陽殷墟幾無以比肩。二里頭文化的重要而特殊的學術價值，為世界考古界所公認。

從二〇〇五年開始，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合作，展開「二里頭文化玉器工藝研究計劃」，該項目工作前後延續已十多年之久，其中工作除全面整理二里頭出土玉器外，更在全國以至東亞廣大範圍，就二里頭文化相關玉器進行實物資料的觀察和記錄。

迄今，該項目的結項及報告出版已進入最後的階段。為更豐富是項研究內容及深度，我們於2016年3月1日邀請國內外相關學者，舉行第一次以「玉器與王權誕生」的學術研討會，出席學者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考古工作隊許宏隊長及趙海濤副隊長、同考古所長期從事二里頭科學技術分析的趙春燕女士、鄭州地區夏商考古代表學者顧萬發院長、山東大學史前考古權威樂豐實教授、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世界著名金屬研究專家梅建軍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鄧聰教授。他們都是對二里頭文化相關研究的國際知名學者。與會學者發表題目包括：

1. 樂豐實：日照兩城鎮遺址M33
2. 許宏：二里頭M3及隨葬綠松石龍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
3. 鄧聰：二里頭綠松石嵌片製作技術初步考察
4. 顧萬發：新論花地嘴陶甕的朱砂繪神面
5. 趙海濤：2015年度二里頭遺址中心區考古工作新收獲
6. 秦小麗：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陶器擴散及其背景
7. 趙春燕：銅牌飾、膠黏劑及其他
8. 梅建軍：二里頭遺址鑄銅業的技術特徵和歷史地位



「玉器與王權誕生」研討會合照



與會學者總結發言

文物館「習古·創新」寫書法及「親親古文字」親子工作坊

配合「瓊瑋博達——常宗豪書法展」，文物館分別舉辦「習古·創新」寫書法及「親親古文字」親子工作坊。其中「習古·創新」寫書法活動，分別於3月19日及4月16日舉行，並邀請藝術系兼任講師陶淑慧小姐擔任指導老師。書法班反應熱烈，合共超過三百人報名參加，參與的同學們增進對古文字的認識之餘，亦在小木版上創作書法，一嘗創新的滋味。



適逢母親節，文物館於5月7日舉辦「親親古文字」親子工作坊，對象為5至10歲的兒童及其家長，旨在帶領小朋友及家長認識中國書法之古文字，從而培養他們對中國藝術文化的興趣。是次活動吸引了20名兒童及家長參加，他們除了學習到不同古文字的書寫方法外，更親手於紙扇上創作，成為別出心裁的母親節禮物。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協辦

「粵研粵有趣——粵語研究面面觀」書展及講座系列

「粵研粵有趣——粵語研究面面觀」書展及講座系列於2016年3月至5月間，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舉行，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粵語研究中心和大學圖書館合辦，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協辦。

是次書展展出超過五十本有關粵語研究的書籍，並舉行三場講座，分別邀請了馬詩帆教授（香港大學）、莊域飛教授（香港浸會大學）、片岡新教授（香港教育學院）、歐陽偉豪博士（香港中文大學）、鄧思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和樊善標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以「粵語」為主題發表演講。



「粵研粵有趣」講座各場講座節錄如下：（節錄自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語言學冰室」微博）

第一講「非母語者的對談」

於2016年3月30日於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圖書館進學園舉行，邀請了香港大學語言學系的馬詩帆教授（Professor Stephen Matthews）、浸會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的莊域飛教授（Professor John C. Wakefield）和香港教育學院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的片岡新教授（Professor Shin Kataoka）作為演講嘉賓，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的鄧思穎教授主持。

三位都是非以粵語作為母語而又從事粵語語言學研究的教授。在講座一開始，講者分別講述自己學習粵語的原因，然後分享他們學粵語的心得，例如多看書籍，電影和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莊教授認為要學比自己程度更難一點的粵語，才能進步，否則只是原地踏步。他也提及學習語言的動機十分重要。而片岡教授認為學粵語不像學英語和普通話那樣，有較為正式、標準的說法。學習粵語，往往要懂得用口語，才能真正學懂粵語，他會通過與香港人交流，聆聽他們的發音和語法，學習地道的粵語。



(由左至右) 鄧思穎教授、馬詩帆教授、莊域飛教授、片岡新教授

三位教授在這次講座提出了一些粵語研究課題的建議。例如句末虛詞「啫」、「係啦」等的意義；根據社會語言學，在相同的情景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於適合和不適合說的話有不同的見解；粵語口語的發展歷史等等。

鄧思穎教授之後問到有關學習粵語聲調、語法和詞彙等問題。莊教授先學習了耶魯拼音，他認為以英語為母語的人用耶魯拼音學習粵語聲調較為容易。他當時不斷依照粵語教科書的內容朗讀粵語，訓練自己的發音。莊教授還分享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會容易把英語的語調運用到粵語中，例如英語以改變語調的方式，強調事物，往往把這樣的方式運用到粵語中，以「唔係，我要藍色」為例，為了強調句中的「藍」，由原來低降調的「laam4」說成高平調的「laam1」。片岡教授認為自己因有普通話的底子，更容易掌握粵語的聲調。另外日文也有保留入聲讀音，方便日語母語者掌握粵語的入聲。但是在學習粵語韻母的時候，他表示自己遇過一些問題，例如由於日語沒有「in」和「ing」的分別，對日語母語者而言，很難分辨「煙」和「櫻」的讀音。除此之外，片岡教授認為粵語流行曲歌詞與聲調很有關係，因此聽歌也能學習聲調。

在學習粵語詞彙和語法時，三位教授也遇過一些有趣的現象。莊教授以雙賓動詞為例，粵語語法中將直接賓語放在前，間接賓語放在後，正好與英語相反。片岡教授注意到粵語「啲」的運用十分有趣，例如「不如早啲抖啦你」和「不如早抖啦你」，兩句句子只差一個「啲」字，但意思卻大不相同。

對於目前香港小學以普通話教中文（簡稱「普教中」），他們有以下的看法：馬教授認為在決定使用哪種語言作為教學語言之前，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在沒有足夠的研究支持下，用普教中是不太妥當的做法。莊教授認為小學就採用普教中是政治決定而非教育決定。如果目標只是讓學生懂得說普通話，只需要開設普通話科就可以。現時小學生學中文字已經很困難，學習普通話拼音會加重負擔，加上家長不一定熟悉普通話，難以幫助孩子，這對於小學生學習中文並非益處。片岡教授同樣不贊成普教中。他認為學普通話固然好，但與普教中是兩回事。

在講座的最後，三位教授對於粵語今後在香港的地位分享了以下看法：馬教授觀察到目前部分孩子在學校或在生活中，都是使用普通話而非粵語，是語言轉變的開始。粵語今後在香港的地位如何，莊教授認為視乎香港人對粵語的態度。片岡教授提出兩文三語應該要有平等的地位，此外，不應只要求香港人懂得兩文三語，還應該讓住在香港的外國人也學會粵語。

第二講「一切從語法開始」

於2016年4月6日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圖書館進學園舉行，由香港教育學院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錢志安教授擔任主持，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鄧思穎教授和歐陽偉豪博士暢談粵語語法。

研究粵語的緣起鄧教授和歐陽博士自九十年代開始著手研究粵語，兩位都表示當初選擇研究粵語是源於個人興趣。歐陽博士回想當初在英文系修讀應用語言學碩士時，有感語言研究科學性強，加上以哲學角度研究粵語十分特別，因而踏上粵語研究的路。鄧教授則是基於自己對語言的濃厚興趣，加上粵語是他的母語，研究自己熟悉的語言甚有挑戰性，希望通過研究粵語能令自己對母語有更深入的認識。

「活」的粵語語言並非一成不變的，語言會隨著社會環境和時代變遷而改變，與不同語言接觸也會令語言有改變。粵語是「活」的語言，三位嘉賓都能夠感受到過去十至二十年粵語的變化。錢教授表示粵語有雅化的趨勢，這現象很可能是正規教育使用粵語教學，中小學生使用粵語朗讀標準書面語所致。鄧教授指粵語口語中出現「讓」字句就是一個例子。而鄧教授與學生接觸時，察覺到許多年輕學生對於上一代的粵語詞彙已經感到陌生，反映粵語流變速度很快，不同年齡層所使用的粵語詞彙也不同。歐陽博士補充，因香港華洋共處的語文環境，粵語的詞彙也會因接觸英語而有所改變。

從粵語書寫到粵語教學的反思近日歐陽博士於社交媒體上載一則自己以粵語寫成的租約，引來迴響。他認為粵語書寫存在標準化的空間，因很多粵語已有明確寫法，而香港的正式公文都以英文為準，大可以粵語為輔助。社會大眾除了可以關注粵語作為口語語言的使用之外，也可以思考粵語書寫的可能性。

提到「普教中」問題，歐陽博士認為以粵語學習能提升學習的靈敏度。鄧教授也認為粵語是香港學生最熟悉的語言，語言本身既是研究對象，也是學習的工具。鄧教授希望社會大眾可以進一步反思粵語在「兩文三語」教學政策上的地位問題，讓下一代對粵語能有更深入的認識，使粵語能夠繼續保留下來。

第三講「一切從文學開始」

於2016年4月13日於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圖書館進學園舉行，由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鄧思穎教授擔任主持，同系樊善標教授擔任講者，討論粵語與文學相關的講題。

樊善標教授討論了粵語對於文學創作的重要性。一般認為，粵語生動活潑，富於表現力；粵語接近古漢語，宜於誦讀古詩文。樊教授則通過分析粵語在文學作品中的使用效果，指出語言並無高下之分且變動不居，語言是溝通工具、文化身份、政治立場……對於有志於文學的人，更是需要精益求精的技藝。

「文學作品給予人的快樂中混合有新奇的感覺和熟知的感覺」。樊教授談到，文學作品創作上的「粵語入文」有兩種情況。

其一，作家利用粵語口語營造熟悉感和輕鬆感，拉近與讀者的距離。並常借助「雅俗並置」的手法表達詼諧、諷刺的深層意味。比如，何淡如作「粵語無情對」，廖鳳舒填「粵語律詩」等。

其二，作家嘗試通過典雅文體提升粵語的地位。如十三妹推崇使用粵語口語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以粵語「要諗過一排」譯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的*Reconsiderations*；再如飲江作「粵語新詩」，通過粵語的「陌生化」表達達到「典雅化」的效果。

樊教授頌讀廖鳳舒的粵語詩《嬉笑集》。「癸亥春明紀事」中的「牙煙」「嗌」等都是典型的粵語表達，詩歌通俗而生動，諷刺了議員們打架的情景。樊教授又以唐滌生版《帝女花》為例，分析粵劇中的粵語詞匯，如「邊一樣」「啫」，並指出光緒末年以後粵語成分才開始越來越多地進入粵劇。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學術活動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總結上半年舉辦了多項學術活動，詳情如下：

第二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

「方言語法博學論壇」由香港中文大學和中山大學發起，自2015年開始由這兩所學府輪流主辦，作為促進方言語法比較研究的平台，著重粵語以及漢語其他方言比較研究，推動跨地區研究，並加強學術交流和對話。「第二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由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辦，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協辦，於2016年3月19日舉行，發言學者和報告論文的學者名單及關論壇詳情可瀏覽以下網頁：<http://www.cuhk.edu.hk/ics/clrc/irf/>。

第十六屆粵語討論會

第十六屆粵語討論會由香港語言學學會、香港科技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聯合舉辦，於2016年4月9日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行。是次討論會的主題為「粵問粵開心」，讓從事粵語研究的專家學者和學生聚首一堂，分享最新的研究心得，並切磋跟粵語語言學相關的問題。

第三屆大學中文論壇

「第三屆大學中文論壇」於2016年4月29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由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和中國語文教學發展中心主辦，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協辦。各院校的代表於論壇上匯報新課程的推行情況、課程的特色和學生語文學習的需要，分享寶貴經驗。

語言學講座

哈佛大學黃正德教授於2016年5月30日應邀出席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辦，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協辦的「語言學講座」擔任主講嘉賓，講題為“On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Adjunct-complement Distinction in Nominal Structure”（英語主講）。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辦學術講座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積極與校內其他單位包括中大出版社及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合作，於4月至6月期間共舉辦四場學術講座。由於2016年5月正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周年，因此四、五月的兩場講座，主題亦與此歷史事件有關，而胡發雲先生的講座更邀得著名媒體工作者楊錦麟先生擔任主持。講座地點也不再限於中大校園，6月5日一場更於星期日於尖沙嘴商務書店舉行，以吸引更多公眾人士參與。

各場講座詳情如下：

- 1) 2016年4月29日，「文革中的地下文化：私人藝術與公共歷史」（講者：王愛和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副教授）
- 2) 2016年5月17日，「極權主義的讚歌和動員模式——從五二紅歌會談起」（講者：胡發雲，職業作家）
- 3) 2016年6月5日，「地緣—族群—安全景觀：1950年代的中國安全訴求」（講者：劉曉原，美國佛吉尼亞大學大衛·迪恩東亞研究講座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紫江學者講座教授）
- 4) 2016年6月7日，「北京時間：1950年代民族邊疆的日程表」（講者：劉曉原，美國佛吉尼亞大學大衛·迪恩東亞研究講座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紫江學者講座教授）

如欲重溫演講的錄像，及知悉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最新活動，可透過以下途徑：

- 1) 本中心網頁：http://www.cuhk.edu.hk/ics/rccc/event_main.html
- 2)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uhk21c/>
- 3)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微博：<http://www.weibo.com/ics21c>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合辦紀錄片放映會及導演座談會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合辦「回望—紀錄片觀摩系列」，於4月15日放映紀錄片《陪舞者》，邀得導演王雲龍將親臨現場與觀眾交流。以及於5月5日放映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同學攝製的《族印—家庭相冊》系列短片。該系列曾獲「家·春秋」大學生口述歷史影像記錄比賽「最佳團隊大獎」及「優秀導師獎」。導師李宇宏、技術支援孫浩森及五位同學將親臨會場，於電影放映後與觀眾交流。



導演王雲龍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良渚玉工——良渚玉器工藝源流論集》(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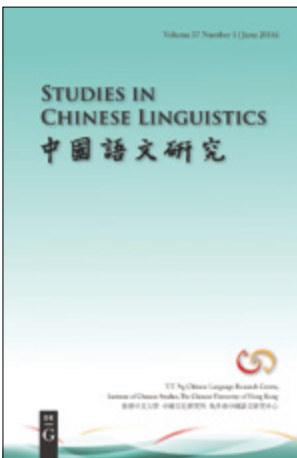
《良渚玉工——良渚玉器工藝源流論集》由鄧聰、曹錦炎主編，是一本五千年前中國長江流域良渚玉器工藝研究的圖錄與論集。本書由眾多發掘良渚文化遺址的學者執筆，共十一篇研究論文，是良渚玉器工藝研究權威著作。內容探索五千年前良渚王者不朽的精神象徵。良渚文明被譽為中華早期文明半壁江山的代表。良渚美玉是東亞史前最重要玉文化之一。

本書前部份圖文並茂，介紹良渚玉器源流、玉器微刻與王權獨佔關係、良渚切割和鑽孔機械等。考古與攝影家合而為一，從獨特視角連環近攝創作彩版，揭示良渚王者玉器工藝的奧秘。

另一部份是良渚玉器源流工藝的論文專著，匯聚眾多親身發掘浙江良渚文化的學者，從考古學全方位角度分析良渚玉器技術的源流。

本著作入選中國文物報社主辦「2015年度全國文化遺產十佳圖書」第一輪投票。評選專家組評語為：「乍一看覺得很華麗，內容是非常樸素和學術的，強調利用微痕分析來探討技術、玉器和社會，同時也適合非專業人員閱讀。」最後結果將於稍後公布。

訂購請聯絡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或中文大學出版社。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中國語文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

《中國語文研究》第37卷第1期已經出版。本期刊載三篇英文文章：

1. Richard S. Kayne: 〈有關中心語的「無聲說」〉
2. 劉鳳樞: 〈漢語形容詞的句法來源〉
3. 張寧: 〈對語意選擇關係的理解〉

文章可以從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的網頁下載：<http://www.cuhk.edu.hk/ics/clrc/>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二十一世紀》，2016年4月號及6月號

《二十一世紀》2016年4月號(第154期)及6月號(第155期)已經出版。2016年4月號(第154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之主題為「台灣選舉：邁向更開放的民主社會」。評論文章〈台灣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由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陳芳明撰文。並刊載學術論文五篇：

1. 周桂田、徐健銘: 〈進擊的世界風險社會挑戰——紀念貝克逝世一周年〉
2. 常 凱: 〈中國勞動關係集體化轉型中的兩種力量和兩種路徑〉
3. 張英進: 〈學術的主體性與話語權:「華語電影」爭論的觀察〉
4. 王 柯: 〈宗教與戰爭——1930年代日本「回教圈」話語的建構〉
5. 沈志華: 〈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應對中蘇共同干預〉



《二十一世紀》2016年6月號，第155期。「學術論文」推出「文革五十周年專輯」，刊載學術論文四篇：

1. 李遜：〈巴黎公社原則在文革中的蛻變〉
2. 樊建政、董國強：〈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黑材料」風潮〉
3. 王芳：〈官僚派系政治與群眾組織的產生——以上海柴油機廠為例（1966–1967）〉
4. 嚴飛：〈政治運動中的集體暴力：「非正常死亡」再回顧（1966–1976）〉

「研究筆記」欄目亦刊載宋永毅教授（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與文革有關的文章〈廣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二十一世紀評論」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一戰華工的世界意義〉，則由徐國琦教授（香港大學歷史系）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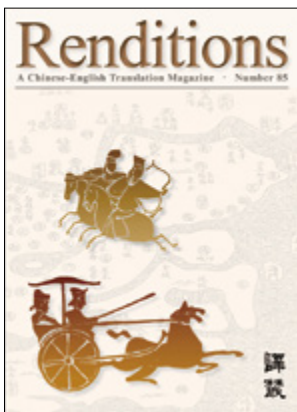
詳細目錄請見《二十一世紀》網站：<http://www.cuhk.edu.hk/ics/21c/>



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顏師古經史注釋論叢》

由潘銘基教授撰著、中國文化研究所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出版之《漢達古籍研究叢書》第三十八種《顏師古經史注釋論叢》，已於2016年6月出版。唐代顏師古著有《顏氏字樣》、《匡謬正俗》，注釋《漢書》、《急就篇》，參與《五經正義》和《隋書》之編撰，著述甚豐，蔚為大家。前人研究顏師古之學術成就，少有從其注釋入手，細論其經學、正字學之地位。本書作者以顏師古在諸書之注解為根本，利用文本細讀，以及排比對讀之方式，討論其釋義與唐代經學之關係，並及其正字學，以及其史注對唐代注史者之影響，從而建構更為完整之顏師古學術研究。

訂購請聯絡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或中文大學出版社。



翻譯研究中心 *Renditions* no. 85

Renditions No. 85 (Spring 2016) is devoted to narratives covering a wide scope of Chinese history. We begin with Erik Honobe's translation of chapter five from Feng Menglong's 馮夢龍 17th-century historical novel, *Chronicles of the Eastern Zhou Kingdoms*. We follow with Ellen Soulliere's translation of the official biographies of the first six empresses of the Ming dynasty as recorded in the *Mingshi* 明史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From these earlier works, we move to the modern period with three short stories: "In Ninety-nine Degrees of Heat", written by the multitalented mid-20th-century woman of letters Lin Huiyin 林徽因 and translated by Yaohua Shi and Judith M. Amory. This is followed by two elegant translations by Dongwei Chu: Xiu Bai's 修白 "The Innermost Rebellion", a plaintive look back at China's time of troubles in the 1960s and its aftermath, and Su Tong's 蘇童 elegant and playful look at the same period, "Fish of the People". This issue ends with another excerpt from John Balcom's fine translation of Chi Pang-yuan's 齊邦媛 extraordinary autobiography, *The Great Flowing River*.

文物館「窯火天工：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歷代陶瓷展」展覽（2016年4月1日起）

陶瓷在中國擁有久遠的歷史，其製作技術的進步、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應用，以及與社會不同消費群體的密切互動，反映著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唐宋以降，陶瓷作為商品大量出口，進一步參與世界經濟與文化的演進，成為了解中國乃至全球歷史所必不可少的文化遺產。

是次展覽遴選歷年各界惠贈文物館之陶瓷精品兩百餘件分批展出，歷時新石器時代至清晚期，為大學的相關教學提供實物例證之外，力求以陶瓷為載體，引領大眾更為直觀地認識中國古代科技、文化以及與世界文明交流的歷史。

是次展覽精選展品如下：



黑彩水波紋雙系大壺
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
文物館發展基金購藏
1993.0266



原始青瓷杯
周
文物館購藏基金購藏
1996.0570



彩繪陶蓋鼎
西漢
吳繼遠先生惠贈
2003.0839



青白釉蓋及蓋托
江西景德鎮窯
宋
關氏家族惠贈
2006.0325



青花蓮池紋大盤
江西景德鎮窯
元後期
文物館館友會惠贈
1985.0121



青花真武坐像
明萬曆
北山堂惠贈
1998.0036



青花萬壽字大尊
江西景德鎮窯
清康熙五十二年
(1713)
利國偉爵士惠贈
1999.0611

展覽日期：由2016年4月1日起

展覽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展廳 II

文物館開放時間：星期一、二、三、五及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下午一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四休館

文物館「窯火天工：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歷代陶瓷展」精選講座系列
(2016年7月20日及8月26日)

為配合「窯火天工：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歷代陶瓷展」，文物館由2016年5月起，每月舉行一次精選講座系列，並邀請內地及香港學者擔任演講嘉賓。五月份講座的嘉賓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秦大樹教授，他於5月6至7日在商務圖書中心尖沙咀分店和文物館進行演講，主題分別為「汝窯的考古學觀察及其管理體制探討」及「定窯白瓷的歷史地位與工藝貢獻」，兩天講座共吸引了近130位觀眾參加。

七月份的講座將由郭學雷教授（深圳博物館副館長）主講「廣彩的起源及早期面貌」，詳情如下：

日期：2016年7月20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3時至5時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L1講室

語言：普通話

講座內容：通過與廣彩瓷器關係密切的廣東銅胎畫珐琅的考察，結合海內外相關重要收藏及歷史文獻、特別是幾例帶有嶺南銘文信息的廣彩瓷與年代可考的紋章瓷，基本搞清楚廣彩的工藝來源、產生原因、創燒時間，進而對廣彩的早期面貌、藝術成就和歷史地位作了初步的歸納總結。

報名方式：<http://goo.gl/forms/j3MFIVgcaW8oqNYj2>

截止日期：2016年7月18日



八月份的講座將由林業強教授主講「康熙青花萬壽尊新考」，詳情如下：

日期：2016年8月26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7時至9時

地點：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

報名方式：<http://www.cp1897.com.hk/activity.php?id=1344>

截止日期：2016年8月24日



編輯委員會

主編：黎志添

成員：徐艷蓮 梁子煒 李潔兒